

陈方竞自选集

上册

Chenfangjing
Zixuanji

陈方竞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01

汕头大学
学术丛书

陈方竞自选集（上）

陈方竞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方竞自选集. 上/陈方竞著.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5. 6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

ISBN 7-81036-853-2

I. 陈... II. 陈...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6651 号

汕头大学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

陈方竞自选集

作 者: 陈方竞

责任编辑: 胡开祥 叶思源

封面设计: 郭 炜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168 1/16

印 张: 51

字 数: 543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全二册)

ISBN 7-81036-853-2/I·155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3005 室
邮编 510620

电话/020-85250103 传真/020-85250480

马新发行所/城邦 (马新) 出版集团

电话/603-9056 3833 传真/603-9056 2833

E-mail: 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第一辑

- | | |
|---------------|-----------|
| 陈方竞自选集（上） | 作者：陈方竞 |
| 陈方竞自选集（下） | 作者：陈方竞 |
| 诗词曲新论 | 作者：张惠民 |
| 古典文学新视角 | 作者：李定广 |
| 词语与言说 | 作者：张卫东 |
| 文艺学丛谭 | 作者：燕世超 |
| 鲁迅《故事新编》研究及其他 | 作者：吴颖、吴二持 |
| 重构女性话语 | 作者：庄园 |
| 文化名人面对面 | 作者：庄园 |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 总序

课堂教学是大学教育的肌体，科学研究则是大学教育的灵魂。

游离于课堂教学的科学研究就像游离于肌体的灵魂，无法为大学教育注入新的生命，也无法成为整个大学教育的一个有机构成成分，而脱离科学研究的课堂教学则像没有灵魂的肌体，缺乏新鲜的生命，缺乏创造的活力，只能是照本宣科，人云亦云，吃别人嚼过的馍，炒别人吃剩的冷饭，教师感觉不到创造的乐趣，学生也得不到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课堂教学是大学教育的根，它扎在地下；科学研究则是大学教育抽出的叶、开出的花，它长在树冠、开在枝头。根深蒂固才能叶茂花盛，叶茂花盛才看得出它的根深蒂固。

所以，一所大学不能忽视平时的课堂教学，但也不能忽视教师的科学研究。

我们汕头大学是一所年轻的学校，但正因为年轻，才应当有活力，有朝气。向外，我们应当向国内外名牌大学学习；向内，我们则应当充分开发自己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尽快出成果，尽量多出成果。学术重积累，但更重创造。只有勇于创造，才能有所积累，才能迅速积累。我们除拥有国内其它大学共同具有的有利条件，还有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我们没有理由跟在别亦步亦趋地爬行，我们应当发展得更快些，做得更多些，更好些。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是在汕头大学学校领导和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出版、发行的，准备每年出版 10~20 种，凡是汕头大学教师的科研学术著作（暂时仅限于文科各系），都在资助出版之列。它是我们汕头大学教师科学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我们参与民族的和世界的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希望汕头大学文科各系的教师更加焕发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热情，施展自己的创造才能，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撰写更多更好的科研学术著作，使我们这套丛书出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目 录

- 前言：关于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6
- 1、鲁迅与浙东文化论纲 /45
- 2、鲁迅与中国农民的精神联系的形成及表现 /99
- 3、“大家族”出身之于鲁迅的意义 /119
- 4、“梦”与“境遇”：《呐喊》、《彷徨》解读 /135
- 5、自我生命形态的文化消解：《故事新编》的深层意蕴 /188
- 6、《故事新编》的文本构成性质及其意义 /207
- 7、中国《故事新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222
- 8、人与鬼的“纠葛”与“交融”：鲁迅民间宗教体验的双重内涵 /239
- 9、鲁迅的“魏晋情结”：从“魏晋参照”到“魏晋感受” /258
- 10、对鲁迅与章学诚联系及其“五四”意义的再认识 /276
- 11、对鲁迅与章太炎联系及其“五四”意义的再认识 /293
- 12、在“断裂”的深层：鲁迅、郭沫若与传统文化联系探寻 /312
- 13、鲁迅的现代主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应予深化的论题 /335
- 14、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思考与追寻 /357



前言：关于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我这二十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实际上走的是我在研究著作中质疑的学院派的路子，这种质疑是与自己的经历、体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个性相关的；但随着我的研究的深化使我逐渐认识到，学院派的学术研究应该有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是超脱于自己所置身的现实文化环境的“纯粹”的做学问，另一条则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使学术研究与自己当下文化环境的感受、体验和认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参与当代文化交流以促进当代文化发展。实际上，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超脱于现实，都是对当代文化建设的介入，但对此有自觉或不自觉之分，有自我对当下文化环境的不同感觉之分。就我的文学史研究的经历而言，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推动我的自觉意识形成的正是我对现实学术环境（文化环境）的感受和认识——我在学术研究中深深感到，这种具有自觉参与意识的现实感受起到的是深化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作用。

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我们进行的研究又不是我们的现实感受和认识的直接推衍，现实感受在研究过程中是潜在存在的，是通过与研究对象的对话表现出来的，存在于我们进入文学史的历史情境与研究对象的实际感受中，是在我们触摸文学史史料产生的对人的生命活动的历史感中表现出来的，我把这样一个感受过程称为文学史（历史）的“整体感受”，史料（文学史研究对象）正是在研究者的这种“整体感受”中获得了生命，或者说，史料只有在研究者的这种“整体感受”中才能呈现其文学史价值和意义。那么，在文学史

“整体感受”中，历史感与现实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我认为：历史感要求我们对历史的感受最大程度地具有“客观性”，现实感无疑更多地具有“主观性”；文学史的“整体感受”的形成，是通过“主观”感受的最大程度地“客观”化，实现“客观”化了的“主观”感受。

比如，我们对鲁迅留学日本与“五四”这两个重要时期之间的一段历史的认识是明显不足的，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他这一段时间“唯一的愿望”就是借“读古书”、“抄古碑”“麻醉自己的灵魂”，以忘却那些“未尝经验的无聊”，但这是他在“五四”退潮时的追述，带有追述时的“彷徨”心态；那么，他的这些言辞背后的生命形态究竟是怎样的？他为什么采用这样一种方式？这就要求我们依据史料走近鲁迅当时的心态，走进那个时代的历史情境中去感受不同的人的不同表现，我们只有触摸到袁世凯广布特务以强化专制造成的恐怖气氛，发现鲁迅此时借阅、购买、辑录、校勘的那些古籍以及墓志、碑帖，包括他收集的石刻造像以及金石器物，多是魏晋时代的，他又在反复辑校《嵇康集》，我们才可能认识到“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醉酒佯狂以避迫害的自我保护方式，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鲁迅的生命表现之中——就我而言，这种感受、发现和认识是与自己的现实人生感受和体验内在关联的[注：我自己就曾经以专注于“学术”的方式来“逃避”现实。近读王富仁所著《古老的回声——阅读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对此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和理解。]；如果我们进一步结合鲁迅基于“日本体验”所写的文章和他“五四”时期的创作来思考，就会发现他的这种生命表现又决非偶然，反映了这一段历史境遇深化了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感受和思考，形成了他与魏晋时代深刻的精神联系，其中孕育了贯穿他一生的“魏晋参照”和“魏晋感受”。^①可见我们认识这段历史在鲁迅生命行程中的重要意义，是与我们切实的现实人生体验内在相联系的，这种联系蕴含

①陈方竟：《鲁迅与浙东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5~111页。



在我们对那个我们未曾经历的时代的“整体感受”中，蕴含在我们对鲁迅生命形态表现的“整体感受”中；但是，“整体感受”的形成又要求我们在阅读和感受史料的过程中不断超越现实感的主观局限，最大程度地回到历史中去以形成最大程度客观化的历史感受，当然这种对历史的“整体感受”归根到底还是在感受的基础上形成的，自然融会了我们的现实人生感受，同时也丰富和深化了我们的现实人生感受——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在“感同身受”中产生自己特有的生命感[注：我在写这篇文章过程中，看了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敦煌再发现》，片中临摹和复制壁画的娄婕谈自己的创作体验时说，自己在临摹和复制过程中产生的是种历史的生命感：这可以给我们以启示。文学史研究中触摸史料的感觉也应该是这样。]。我的《鲁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思考与实践》一文从文本上看，明显表现出是在对相关史料的“整体感受”中形成的历史描述，但是在这种对历史的“整体感受”中也更为明显的蕴涵了我对当代文化环境的自觉参与意识，是在充分感受和认识鲁迅的过程中阐发我在当下全球化背景中对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鲁迅的思考和实践深化了我的现实感受，这种现实感受同时又深化了我对鲁迅的认识。

二

显然，在文学史研究中对历史的“整体感受”是相当重要的。但是，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整体感受”具有某种特殊性，这是与中国现代文学之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性质和特征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学和西方文学与它们各自所面对的社会之间在整体上并不构成尖锐的截然对立关系，它们是在社会上可以独立存在并且能够被整个社会逐步吸纳而在社会上得到普泛性表现的，这就使得中国古代文学或者西方文学中的“文学史”研究，结

合或者游离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整体上不会有什么根本的差异，都能得到具有文学史自身发展特征和相对统一审美标准的说明；^①中国现代文学则与此根本不同，它是以其所体现的现代精神而非审美特征在当时社会中获得自己的立足之地的，是在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截然对立和尖锐冲突中发生发展的，它的文学特征是在这种精神特征和社会文化特征中表现出来的，离开了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感受和认识，是无法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缺之不可的对历史的“整体感受”，就不能局限于文学本身的史料。

比如，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学论争非常频繁，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并非就文学谈文学，和当时社会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思想文化冲突有密切关系，而且这种论争直接影响了作家的思想和创作。1927年创造社作家在对“五四”新文学的否定中提倡革命文学，就并非缘于他们对文学本身的认识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有着国际和国内极其复杂的政治背景的直接影响，为当时中国的阶级斗争所直接触发，虽然倡导者对革命文学的认识显得简单幼稚，暴露出他们自身的问题，但“革命文学论争”发生后，大多数从“五四”走过来的作家的创作都转向或倾向于与现实政治有着不解之缘的左翼文学，则是事实。对此，鲁迅1934年在一篇文章中说：“最初，文学革命

①例如中国古代六朝文学摆脱经学的束缚而得到符合文学自身特征的自由发展，所崇尚的“药、酒、女、佛”在魏晋时代的整个社会文化中得到普泛性表现。刘勰的《文心雕龙》从“原道”“征圣”“宗经”即维护中国古代主导意识形态出发阐发文学理论，并没有影响他对六朝文学所提供的文学自身创作特征的概括；唐之韩愈、宋之欧阳修要“起八代之衰”，所针对的既是魏晋时代的文学，又是魏晋时代的社会风气。又如欧洲文学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学观念及文学表现方式上的根本变化，欧洲社会并没有相应地发生根本变化；相反，这些体现不同文学观念的文学都能够逐渐浸润于整个社会生活中而得到普泛性地表现。中国现代文学不具备这种广泛的社会性，在中国社会中明显缺乏这种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



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①这就是说，从“人”的觉醒到“阶级意识”的觉醒，体现了中国现代作家在“前进”中的必然要求，而且“阶级意识”的觉醒较之“人性解放”的要求，反映了中国现代作家更加贴近他们所置身的社会，是他们在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日益尖锐的冲突中的生命体验的文学表现；进一步说，中国现代作家是在“人”的觉醒的基础上实现“阶级意识”的觉醒的，他们在社会压迫中“阶级意识”的觉醒，要求的仍然是人的基本生存和人的“生存困境”问题，是“人性解放”的问题，在那些深刻体现他们的现实感受的文学作品中，阶级性的深度与人性的深度是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鲁迅的这一认识，就是以他“生存境遇”中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受为根基，建立在对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整体感受”之上的，由此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与社会现实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对立性质、特征及其艰难发展历程。我们对此的认识，同样需要建立在对史料的“感同身受”所必须的对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整体感受”之上；只有这样，我们面对的文学史料才可能从“故纸堆”中走出来，才可能从不切合我们的实际感受的既有描述中走出来，在我们的感受和认识中重新获得生命力。

实际上，鲁迅的文学史观所重就是具有社会普泛性的史料，他1932年在写给台静农的一封信中说：“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

①《且介亭杂文·〈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第20页。本书注释所引《鲁迅全集》，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子然于学林之外”。^①他以“通行之本，易得之书”与“孤本秘笈”对举，自认“子然于学林之外”，这是他直面现实社会人生的思想特点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他认识文学重视的是那些能够透视社会人生中的生存状态的史料，这只能存在于与社会人生天然相亲和的“通行之本，易得之书”中。诸如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注：我认为这篇文章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迥异，全篇渗透着他自身的创作体验，有着他当时境遇中的生命体验，也有他对“五四”新文学的认识。]^②、《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并不以史料的新颖、独特见长，而是在对时代和社会的“整体感受”中认识文学，在对那些为人熟知的史实要言不烦地勾勒中显现他透视文学的眼光和“史识”。在这方面，鲁迅曾提出认识历史可多看流传于民间的“野史和杂记”（还提到“笔记”、“杂史”、“杂说”），因为它不摆“史官的架子”，“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容易从中感受和认识那个社会，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忽然想到·四》、《这个与那个·读经与读史》）。这值得我们重视。就我自己而言，1978年始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就有研究的欲望，但阅读史料找不到自己的感觉，无从着手。1980年在南京大学学习期间，我的指导老师邹恬先生借给我看香港出版的曹聚仁的《文坛五十年》，这是一部“野史”，谈的多是并未载入“正史”的文坛佚事，视角独特，结合社会文化背景认识新文学，如他谈到这么一桩被我们的“文学史”舍弃的史实：“一九二四年春间，郑振铎翻译的《灰色马》（俄国路卜洵 Ropshin）出版了，这部虚无主义的小说，到了现在，已为社会人士所淡忘，在当时却是文坛一件大事”，“《灰色马》的出版是热闹的。前面有瞿秋白、沈雁冰（茅盾）的序文，后面有俞平伯的跋文”。他引出郑振铎在这本书的“引言”中的话：“这书不仅仅是文学，这是人生的悲剧”，“我觉得佐治式的青年，在现在过渡时代的

①鲁迅 1932 年 8 月 15 日写给静农的信。见《鲁迅全集》第 12 卷第 102~103 页。

②参见本书中的《学府与报刊出版：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中的“症结”透视》。

中国渐渐的多了起来。虽然他们不是实际的反抗者、革命者，然而在思想方面，他们确是带有极浓厚的佐治的虚无思想，怀疑、不安而且蔑视一切”。显然，这是曹聚仁从对时代的“整体感受”中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现象，足以再现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和时代青年的精神状态，如他所说：“佐治式的青年，也正是巴金小说中人物的写照，也可以说是所有那一时代青年的写照，虚无思想，实际上，乃是五四运动以后，最流行的思想”。^①这样的史实有助于我们这些“后来人”进入那个时代的历史情景中，形成对当时社会的“整体感受”，感受到鲁迅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②的时代内涵，触摸到在时代青年的生命表现中像瘟疫一样蔓延着的苦闷的时代病；苦闷、虚无和怀疑，也正是刚刚从文革中走出、已过“而立”之年的我（我们），在“过渡”时代特有的心境。这种“整体感受”使我在阅读中国现代文学的过程中首先关注的是“五四”退潮后的新文学作品，思考为什么会出现“《沉沦》热”[注：记得郁达夫的《沉沦》（小说集）和冰心的《超人》当时曾深深感染了我，我最初的研究着眼的就是他们的作品体现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小说《超人》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反响，从这种感受和认识出发，就不难理解黎锦明 1927 年所说：“今日青年在革命上所生的巨大的反抗性，可以说是从《沉沦》中那苦闷到了极端的反应所生的。”^③这里体现的正是新文学与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对立性质；而使我对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所述“五四”退潮后的苦闷期文学，以及前述文学革命为什么会发展为革命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为什么会从“人”的觉醒发展为“阶级意识”的觉醒，有了属于自己的真切的感受。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④

①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 年版；第 248 页。

②《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159 页。

③黎锦明：《达夫的三时期》，收素雅编《郁达夫评传》，上海现代书局 1931 年印行；第 79 页。

④见本书中的《“五四”退潮后苦闷期文学及其外来影响》和《五四新文学发展中的个性主义问题》。

显然，我在这里谈的主要是我们已经十分熟悉的现代文学史料如何才能转化为我们研究中有生命力的成分——这种转化的直接前提和必要条件是对文学史的“整体感受”。我提出这个问题，所针对的是近些年来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西方文学（西方文化）或者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化）为标准出现的“经典化”潮流，这一潮流在客观上会使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化）沥除出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趋向中，我们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研究中阉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性质和特征，在研究中表现出的“纯文学”意识，相应地仅仅关注文学本身的史料。因此，要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回到中国现代文学那里去，加强我们对与我们当下文化环境的感受内在一致的那个时代的“整体感受”，就显得更加重要。但是，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毕竟在外在表现形式上发生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变化，诸如我们带着不可能抹去的现实人生感受在与历史的“对话”中缺之不可的对语言文字的感应，可能在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过程中的第一反应就是对那个时代的文学语言的陌生感[注：我在教学过程中发现现在的中文系学生阅读“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越来越感到困难，困难首先就在对文学作品的语言的陌生。]，这种陌生感使我们难以触摸到“五四”从中国古代语言蜕变出的白话语体的内在艺术魅力，更不要说体味其中蕴含着的丰富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受；这就要求我们回到历史中去，去感受和认识“五四”语体变革为什么会发生，是怎样发生的，它的价值和意义究竟在那里。就我自己而言，为形成对历史的“整体感受”，虽然重在阅读并感受文学作品，但同时我也注重阅读有助于理解作品的相关史料，读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以民间身份书写的历史，注重他们所提供的史料，后者对我的研究的深化也起到重要作用。

我想就我写作《鲁迅与浙东文化》一书的情形谈谈这方面的一些切身体会。我最初着眼的是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这与我在“文革”后期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相关，而多少有些



与当时的研究趋向“背”着做，我在研究中虽然也有一些发现，但研究明显缺乏对当下文化环境的切身体验的自觉意识，我自己也觉得在我写的研究文章中无法融会自己阅读鲁迅作品的切实感受，但又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注：在这部自选集中我特意选入我这方面的一篇研究文章，以示对照。]当“浙东文化”这个概念进入我的思考，才真正激活了我的这一研究的自我感觉。这是受谭其骧先生有关地理历史学方面著述的启示，如我在研究文章中经常引述的他的《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这篇文章，就使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我注意到他反复提到希望能给以重视的明万历年间浙东临海人王士性的地理历史学著作《广志绎》，依着《广志绎》的提示我又读了浙东金华人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注：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中谈浙东的文章，还有陈桥驿先生有关越文化的地理历史学著作，还有周作人在文章中对浙东与浙西的民风民俗、文学艺术甚至学术思想之不同的区分，等等。读这些著作的感触甚至比我亲临鲁迅故乡的感受来得还要深切，原因在于，这些书面材料使我感受并认识到“浙东文化”蕴涵着某种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在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向发生蜕变中具有的特殊价值和意义，我的这种感受和认识与我阅读鲁迅1909年从日本回国后整理的故乡历史文化典籍产生共鸣，我发现鲁迅1914年完成的《会稽郡故书杂集》这部最富代表性的故乡文化典籍突出并强化的就是浙东文化中这种特殊地理历史文化传统，鲁迅对此的发掘是与他在《文化偏至论》中确立的“文明无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①的变革思路内在一致的。这种发现是在对中国文化主流发展趋向的“整体感受”中形成的，又是在对鲁迅终其一生的创作的“整体感受”中深化的。从这种“整体感受”出发，我触摸到鲁迅作品中的这种地域文化传统蕴含在他的生命形态的表现之中，这种自我生命形态的表现又反映了他生存

①《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9页。

境遇中的生命体验赋予了这种文化传统以现代意义。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深化了我对鲁迅开拓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相对立的性质及其体现的社会文化特征。^①我在这样一个基点上开始了《鲁迅与浙东文化》一书的写作，以揭示中国新文化、新文学发生的浙东背景，在这一背景中显现了鲁迅的“拆散时代的怀疑和绝望”。《鲁迅与浙东文化》奠定了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收入本书的我对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甚至包括对穆木天的研究，还有我写的《多重对话：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一书，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去的。

三

我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整体感受”，目的主要在于使我们的研究深入到文学史的具体“语境”中。我在《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②一书的“自序”中强调期刊的重要性，认为“期刊比著作更能再现‘当年情景’”，就是从这种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整体感受”出发的，由此触摸史料形成的“语境”感，可以使我们对那些已知的史料有更多地发现和感受，这种发现和感受的核心内涵就是人的生命在其境遇中的表现。我在研究中深深感到，在历时半个多世纪尤其是近二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我们的史料视野在不断开阔中又不断被缩小，20世纪90年代在前述“经典化”思潮影响下的文学史书写，那些在我们看来与文学无关的史料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中逐渐消失[注：“五四”时期甚少纯文学期刊，我认为“五四”后出现的文学期刊也并非真正是“纯”文学的，我们同时需要感受文学期刊中的那些在我们的意识中并非属于“文学”的史料]，使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呈现出与我们对当代文化环境感受并

①参见本书中的《鲁迅与浙东文化论纲》和《自我生命形态的文化消解：〈故事新编〉的深层意蕴》。

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不切合甚至截然相背的趋向。我们在现实文化环境中可能有着更为清晰的语境感，这是现实文化压迫促使我们的主体性的自觉使然；那么，我们的历史语境感那里去了，这需要我们从现实感受出发进入到历史情景之中，形成我们对历史的“整体感受”。在这种情形下，那些被我们的文学史舍弃的“边角余料”，可能更有助于我们形成对历史的“整体感受”，形成历史的“语境”感。

比如，我在重读《新青年》的过程中，注意到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的一段用括号括起来而不显分明的话：“此时，我应声明：现代鼓吹节烈派的里面，我颇有知道的人。敢说确有好人在内，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对，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好人，便竟能从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愿他回转身来。”^①我认为，这段似乎与文学无关的话，恰恰有助于我们在“五四”语境中认识《我之节烈观》这篇能够深化我们对《呐喊》、《彷徨》理解的文章。这段话所以用括号括起来，因为这类“好人”并不属于文章主要针对的“节烈救世说”的鼓吹者；但所以如此郑重地提出，又是因为这种“好人”的思想是与文章主要针对的对象有一致之处，他们也是作者写文章时感受到并明确指向的预设读者，或者说文章主要是写给他们看的，也只有他们有可能看。这无疑增强了我对鲁迅是在什么语境中写这篇文章的具体感受，使我去追寻在新文化倡导过程中鲁迅这么说有什么具体的针对。当我接触到仍然与文学似乎无关的北京大学 1918 年 1 月 19 日成立的“进德会”（社团），我从发起人蔡元培的《北大进德会旨趣书》中读出了“五四”极力破除的“酒色误国”的思想，这与“节烈救世说”的内在一致性——在我们的现实文化环境中这类“道德救世”（诸如当下提倡青少年“读经”）的声音还少吗，而有助于我们形成新文化倡导的“语境”感。当我进一步去清理进德会在北大的位置和影响时，发现进德会在校长蔡元培主持，北大校评议会成员皆为该会领导成员，截止

① 《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123 页。